**对抗气候和核武威胁：女性人道主义新定义及全球安全行动**

瑞贝卡·约翰逊，裁军外交研究所

黄小媚翻译

在颇有影响力的电影《愚昧年代》[[1]](#footnote-1)中，在2055年，世界档案的管理员——一位年老的白人，回忆起人类忽视了所有的警告，自取灭亡。他看着2008年的新闻片段和采访，里头有自大的政客，自鸣得意的企业家，一昧地膜拜他们的神明——无限的增长，和不变的“照常营业”。当严酷的气候条件和饥荒摧残了脆弱的国家并导致了大批没有食物来源、居无定所的气候难民时，战争和核武器的使用结束了所有的一切。

新闻片段里鲜见女人或者南方国家的发言，然而他们的角色不容忽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核威胁和气候灾难根植于固有的结构和贪心，长久以来这二者支撑着父权政治和父权姿态，贯穿着被强加的宗教信仰、殖民主义和（过去的和现在的）奴隶制，伴随着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家庭暴力和性别暴力。气候危机的资本家驾驶员，与掌控政治权力、利益和战争决策额的军事-工业驾驶员，这二者相互依赖，并密不可分地与核武器以及其它反人类的武器的生产、部署和使用联结在一起。

几乎所有已知的人类文化、政治、社会和军事行动都是带着性别划分的。一般说来，性别的假定和结构与基于人种、阶层、民族、财富和资源产生的“他者化”的权力关系交织在一起。可以参考年龄-能力关系。生理的年龄与体能和智力水平挂钩，视社会和文化观点及等级制度而定，要么有利于要么不利于个人或者团体。

但是，本文的目的不在于重复性别暴力、资本主义、军事主义的种种理论；而是要看看女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论与行动，是如何重新定义应付事关存亡的安全问题的可行性策略的。

因此我将着重探讨我本身参与过的三场运动：20世纪80年代在格林汉姆公地反对巡航导弹的妇女和平营；“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及其在2017年取得《禁止核武器条约》时发挥的作用；以及最近集结在“反抗灭绝”这个名义下爆发的几场非暴力运动，它正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要求人们立刻看清气候灾变对全球生灵的威胁。

亲身经历这三场运动给了我直接的经验，让我能够对此进行分析；活动外的研究者或许没有注意或无法从其理论或实践的角度看清这些事实。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我的分析受限于我作为一个英国白种女人、社会学家和运动家的经验。这并不意味着我说的是错的；但必须认清这些限制[[2]](#footnote-2)。气候灾变和核武器已经、并且会继续不成比例地伤害这个地球上最脆弱的人群和物种。尽管南方国家数十亿的人口活跃在自己的社区，他们的声音依然不能被北方国家主流媒体或掌控决定权的人听到。

这也就意味着，像我一样有能力发声的人，必须带着责任感发言，为其他人创造更大的机会——尤其是那些脆弱的、处于劣势的人——并且采取更谨慎的行动。20世纪70年代当我在为女性权利游行的时候，我学到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而且我们必须“对权力说实话”[[3]](#footnote-3)。将近50年后，当我加入新一代的反抗灭绝、警告世人我们面临的气候和生态危机时，标语上书的是“说出真相”、“现在就行动”和“为了生命反抗”。

在进行交叉式阅读和讨论今后的挑战前，我先简要介绍一下三场运动。

**格林汉姆公地：阻止美苏核武竞赛**

20世纪80年代早期是冷战时期最紧张的时期，50,000个核弹头已经部署开来，等着哪个人犯下错误。197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决定在五个欧洲国家部署新一代的中等射程地面核导弹，首当其冲的，便是位于伦敦西面60英里外的格林汉姆。

在“为了地球生命的女人”的标语下，二三十个女人带着孩子，从威尔士走了十天的路，在1981年9月5日抵达格林汉姆公地美国空军基地。他们的要求很简单：与政府官员举办一场电视辩论，讨论在英国部署巡航导弹的决定：所谓的“双轨策略”和“零选择”。但没人搭理这些女人。于是她们把自己用铁链拴到美军基地的大门上，也使人联想到当年的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后来开始下雨，当地人带来帐篷和食物。数日、数月、数年后，妇女和平营正式成立，成为全球和平妇女的一个灵感来源。

在此我不想描述当时我们采用的种种有创意、具有开创性的非暴力行动，其中包括在核导弹发射井里跳舞、占领空中交通控制塔、扰乱核武军事行动。有几次我们把通往基地的所有大门封锁了好几天，还破坏了几英里长的军事围栏。我们用钳子在围栏上剪出小洞，然后用这些“门和窗户”进入核基地的要区。我们开美国空军的车，在榴霰弹、飞机和巡航导弹发射器上涂上象征性的血液，写下和平口号，打乱、延误它们的使用。还有一次，我和其他两人潜入机库，巡航导弹正在被装到“运输竖起发射装置”上。趁我的同伴引开士兵的注意时，我爬进了一个发射装置的驾驶舱内，把自己锁在里面。我们其实并不清楚导弹里有没有导弹头；但在半个小时的僵持后，我投降了，因为我担心那些发怒的武装士兵会伤害我的同伴。

当这些发射器和随行的警卫、警车开上公共道路来“融入乡村”（军方是如此称呼这些核武军演的）时，一路上他们都被格林汉姆的女人和当地以观望作为谴责的居民注视着，被涂上粉红色的粥、油漆，还经常被众人阻挠甚至登上车。就算被无数次地驱逐、逮捕或者关进监狱都无法熄灭我们的意志和决心：一定要和这疯狂的核军事做对抗。唱着抵抗和自我赋能的歌，我们继续在格林汉姆以及其它的基地做抵抗，直到1986年，戈尔巴乔夫和里根政府终于有了点理智，在雷克雅未克举行裁核会谈。1987年12月，双方签署了《中程导弹条约》，禁止在欧洲部署地面中程核武器。这当然还不够，但至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在促成《中程导弹条约》的种种政治、压力和反抗声浪中，格林汉姆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其它角落，市民们走上街头，到北约基地进行抗议。科学家和医生发表关于核冬天的研究，以期劝说美苏领导人“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4]](#footnote-4)。在欧洲和日本，上百万的人要求解除核军备；美国的市民集结在“冻结核武器”的口号下，要求美国和苏联解除核军备，作为结束双方致命的军备竞赛的第一步。

当政府打压和平运动的时候，数百名格林汉姆女性被捕入狱，营地屡次被清空。尽管如此，或者说正是因为我们面临困境，格林汉姆的抗议发展成为一个不同寻常的、充满创意的开端，挑战并改变当时和平运动和性别政治的愿景。格林汉姆启发并联结了全球各地越来越多的女性，我们和反抗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性别暴力并肩作战，因为这种种暴力夺取了无数原住民的生命，他们往往首当其冲地受到军事主义和核武器及其它反人类武器的生产、测试和实验的威胁。

作为一个不想有任何领导、也不想依赖领导的女权运动，格林汉姆的妇女们坚持强调我们都有的权利以及我们必须施行的责任。我们所编织和绘画的蜘蛛网的象征意义就是：唇亡齿寒的相互联结和共同分享的能力。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没诞生呢。

一开始，妇女们走向格林汉姆是为了阻止美苏核武器军备竞赛，第一步便是阻止新一代的SS20潘兴巡航导弹。妇女和平营——至少在第一个十年的“格林汉姆的女人们无处不在”的活动中——意义不止于此。生活在父权和军事主义中并从中学习，格林汉姆的女人们挑战自身，也挑战所有的一切，包括业已接受的权力理论，以及“消极抵抗”和“公民不服从”的父权式的非暴力模式的发展。

**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废除核武器乃人道主义的职责**

现在我要跳过三十年，到2007年。女性主义者、医生和人道主义裁军活动家们在澳大利亚共同成立了“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并发展了一套人道主义的合法策略，促成了2017年的《禁止核武器条约》。这份条约是数年来运动推向的巅峰，在这份条约中，核武器被重新定义为人道主义问题的集合，需要被禁止和清除；而不仅仅是作为一国的军事防卫手段，仅需要被限制和管治。条约的谈判由哥斯达黎加的大使伊莱恩‧怀特‧戈麦兹主持，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大多数的北约成员国选择抵制谈判，超过三分之二的联合国大会成员国参加了谈判。2017年7月7日，122个国家赞成通过条款，一票反对（荷兰），一票弃权（新加坡）。通过的票数远远高于反对者预期。自2012年以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审议会议上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约加入，再加上联合国大会决议，这些都有助于争取人们支持，将《禁止核武器条约》视为人道主义的必要措施。

“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的策略有三：一，通过非暴力的改变以解除父权的女性主义理论；二，1997年渥太华禁用地雷条约及2008年奥斯陆禁用集束炸弹条约的缔结经验；三，关于核爆后人道主义的灾难性后果及威胁的最新研究，包括因核冬天气候后果导致的全球性的饥荒；通过在奥斯陆、纳亚里特和维也纳举办的一系列关于“人道主义后果”的全球会议，研究核武器的威胁和后果；以及在2013年至2016年间，联合国组织的两个开放式的工作小组的研究成果。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清楚告诉世人，核技术对我们共同的安全、健康和环境有极大的威胁，任何故意或意外的核武器使用都将是灾难性的。自从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以来，选择加入“无核武器国家”并放弃拥有核武器权力的国家被边缘化，在决策上没有多大发言权；因为不扩散框架其实有利于五个主导不扩散条约的核武器国家（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去攫取利益、自主行动；而且也越来越有利于四个没有加入条约但拥有核储备的国家（印度、以色列、北朝鲜和巴基斯坦）。

不同于不扩散和军备控制政治游说，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在第一个十年里首要关注的是面向无核国家的公民社会、议员和政府做宣传运动，这些无核国家大部分属于南方国家。我们的目标是展示给世人，裁核不仅仅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事；没有核武器的国家有基本的安全利益、权力和责任保护国民免受核爆灾难。将核武器置于人道主义的框架内改变了局面：原本是控制武器，占主导权的是拥有核武器的一小撮国家；现在是废除核武器，国家和国民集体使用他们的法律和政治力量唾弃并禁用核武器，从而产生一个新的法律框架来禁止核武器的使用并清除现有的核储备。

当2017年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颁发给我们由近500个公民社会组成的网络时，高度赞扬了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引起了世人对于使用核武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注意，并为实现以条约为基础的禁止核武器的使用做出了开创性努力”。此奖提高了《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可信度，也增加了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推动此条约生效和施行的能力。现在我们有了《禁止核武器条约》。通过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的“议员宣誓”、在市政级别将条约立为法律的“城市请愿”，以及在金融方面的倡导“别投资炸弹”等等，禁用核武器的条文已经渐渐地融入到法律法规中，甚至在一些抵制谈判的国家中也如此。

**“反抗灭绝”——现在就行动，防止气候灾难**

成立“反抗灭绝”组织的气候活动家、科学家和律师知道他们已经赢得了关于全球暖化和气候变化的争论。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简称IPCC, 成立于1988年，由195个政府及上千专家组成）到最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的《巴黎协议》，有兴趣的人可以得到所有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事实和证据。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数据，而是迫在眉睫的人类的认知和理解。如常政治与照常营业数十年来狼狈为奸，阻碍本应立即采取的行动——倘若尚有避免气候崩溃和全球物种灭绝的可能性的话。

势力正不断减小的否认气候变化的人有三类：狂热地相信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与其永恒增长的鼓吹者；贪婪“愚蠢”、一意孤行、故意忽视或扭曲事实从而可以继续靠污染、破坏自然谋取一己私利的“蠢人”；还有一些人，认为能力有限，害怕改变，想牢牢抓住习惯了的舒适和生活方式。我们这个“愚昧年代”被惰性、贪婪、自大和恐惧所麻痹。

当瑞典在校学生格瑞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坐在瑞典议会门口而不是去上学，从而点燃全球年轻人的热情，也走上街头为气候变化示威时，她明白气候变化的威胁。她害怕，她无权无势，但是她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正如1981年格林汉姆妇女和平营的开始一样，格瑞塔的罢课也是出于绝望之举。格瑞塔或者格林汉姆的活动者都没有建立某种运动的计划，然而正是她们以一己之坚忍不拔的反抗，促成了运动的开展。

作为对比，“反抗灭绝”有策略地唤醒全世界——尤其是那些有权做决策的人，让世人明白我们正面临的气候问题的迫切。反抗灭绝的关键口号是：“醒醒”，“现在就行动”，以及“说出真相”、“超越政治”、“为了生命反抗”。这些讯息并不是仅仅针对政府，也适用于普罗大众。我们必须看清我们正在做的事，并且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从而达到：

阻止正在加速的气候灾变；

减少、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

改变使用浪费、造成污染的能源使用现状；

阻止与人类共享地球的其它物种的灭绝；

发展出“再生文化”，提倡关怀、负责任、健康的生活、复原力和适应能力。

“反抗灭绝”在英国成立时，把组织目标定位在“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运动，用非暴力公民不服从来实现重大转变，从而降低人类灭绝、生态崩溃的威胁。”在2018年10月31日正式与公众见面、由1500人在伦敦国会广场签署《反抗宣言》前，“反抗灭绝”的核心小组研究了运动建设该做与不该做的事，并选择用一个被生命之圈包围的沙漏（计时器）作为简单有效的象征。通过大量的讨论，小组把要传达的信息和目标精简，并发展出一套反抗灭绝的哲学原则和非暴力行为模式。正如格林汉姆和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一样，反抗灭绝的目标中也掺杂了女性人道主义原则，尽管并不是明确自我标榜。

自从那时起，据官方网站介绍，反抗灭绝的蔓延 “从所罗门群岛到澳大利亚，从西班牙到南非，从美国到印度”。自2019年4月15日起，反抗灭绝在全球超过80个城市起义，成千上万的活动者阻塞了伦敦的滑铁卢大桥、牛津圆环、皮卡迪利圆环、大理石拱门、国会广场和威斯敏斯特桥长达一星期。不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第一步，即吸引注意、改变论述，已然发生。

那么，究竟是什么特征将这三场运动联系在一起？它们和争取民主、人权的公民社会运动及其它参与式政治变革——比如2009-2012年伊朗的“绿色革命”、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埃及的“解放广场”等，争取“真正的普选”、透明、爱与和平，有什么不同？反抗灭绝的口号提供了最贴近当下的例子，用来说明女性人道主义所面临的挑战，因此也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

**醒醒**

所有的社会运动，都有某种形式的“叫醒”讯息，警告面临的危险。可能是政治方面的危险，比如压迫、法西斯主义、胁迫式控制、宗教极端主义或者战争。示威者说，不要梦游着掉下悬崖。格林汉姆的妇女们将核战争和气候灾变定位为生存的威胁，国际废核运动和反抗灭绝更近一步，警告说“醒醒，不然就太晚了。”信息很急迫，但把无作为当做“睡觉”而不是自动自愿的愚蠢、贪婪或拒绝接受。这或许是很好的标语口号，但不是一个策略。

有效的政治改变要求能理解困难何在，以及权力运作的方式。不论是通过选举、立法（包括条约）、推翻政治精英、或者转变本国或国际的体制，一场运动需要或不说自明或明确表达的转变理论，从当下的情形说起，并指出何为障碍、何为目标。谁有权力？如何行使？什么样的结构机制得益于消极的、沉睡不醒的大众？

从历史和经验中我总结出关于改变的个人分析。某些政策的改变可以通过递增线性的步骤实现，但大多数的改变无法通过此种方式取得。成功与否取决于你能否看清自己想要的改变、面临的挑战，并采取恰当的策略把自己带往要达到的目标（或尽可能接近目标）。倘若改变可以一步一步取得的话，那么将运动视为一场拔河也未尝不可；仿佛一条绳子，一米一米地把它往后拉就可以带来“成功”或者“胜利”——取决与如何看待目标的达成的。但倘若这中间有个悬崖要跃过，一步一步地走只会导致掉下悬崖。你必须计算出为了获得足够的加速度，在跳跃之前你需要跑多少。如果可行的话，那么就整理好所有的缁备和精力，往前冲；倘若不可行，那么就找到另一条路绕过去，不论这条路是多么陡峭或艰难。

裁军就像是要移走一大块石头。这不是线性的过程，而且跃过它也不可行。减少或甚至禁止某类武器的使用或某种军事行为并不一定能带来下一步的成功。必须减弱和清除的是扎根已深的意识形态，它得到军事集团、军事工业及政治得益者中有权势的利益团体的支持。因此，想要取得成功，公民社会必须从多个角度介入：政治、法律、环境、外交、人道主义和道德。某些方面需要往下挖，某些方面则是要推和拉。有权势的派系垂涎某种武器，改变这种思维范式需要不同的组织方式和途径。系在大石头上的绳子看起来似乎很长时间都没有动过；然而通过挖、推和拽，它已经无法停留在原处了。当大石块终于开始动的时候，重力和惯性将使它松动，比用绳子一米一米地拉要快得多、动得远。

当社会变革挑战根植于、并且被军工业利益、父权、权力关系及同样扎根已深的社会秩序强化了的现有观念中时，要实现可持续的改变，就必须要有变革性的目标和策略。届时需要很多要素和行动，但同时必须认清其中有一些是帮倒忙的。比如，谁选择站到石头上去？谁忙于把更多的石头泥块推到本来已经由挖掘、拖拽人员挖出来的缝隙中去？仔细地观察，你会就发现这类似于那些政治演员（不论是在公民社会中还是在政府间），他们擅长把自己放到一个有利的位置，来获得个人权力及自我推销。无论是故意与否，这都落入热爱石块的政府及其他既得利益者的圈套中。

要小心赞助者或权力机构试图通过渐进式步骤来中立公民社会的挑战，这些所谓“可实现的”步骤其实是为了方便政府来拉拢、削弱或将功劳归为己有。也要小心急着要资金或主流肯定的非政府组织，因为反对社会变革的人很容易就可以分配给他们一些无用瞎折腾的工作，要么是为了浪费时间、分散注意力；或者更糟糕的，他们会被操控，让原本有挑战性的创举脱离正轨，称了体制的意。也要警惕既得利益者，他们会嘲笑那些他们害怕有朝一日会成功并带来持续改变的策略和行动。历史已经证明，既得利益者们越是努力让大家去无视、嘲笑、边缘化、屈尊俯就或不把某些倡议、行动当回事，我们就越要关注那些想达成这些创举的人。

**现在就行动**

活动者们所说的“现在就行动”究竟意味着什么？当行动仅仅只是在危机面前的反应或对“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这种感觉的回应时，行动无效。有效的行动能让我们离目标更近，无论是这个目标是行为上的还是立法上的改变、法律条约、政治协议、文化转变、提高意识令他人行动或其它某种目的。有效的行动必须与我们的原则和目标一致。暴力能够清除对手或让对手沉默，但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能够真正带来有建设性的、可持续的变革。大体上，暴力滋生暴力，正如攻击性的和防卫性的行动与回应会发展成为军事主义、恐怖、军备竞赛和战争。相较之下，冲突并不是主要的问题；既得利益者会经常想要阻止、控制、镇压或让冲突噤声。冲突实际上是改变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推动力，正如危机也是有机会让社会更加有保障的组成部分和推动力。

格林汉姆、国际废核运动和反抗灭绝这三个运动都很明确地将“非暴力”作为以他们为名的行动的不可退让妥协的原则。但不要就此认定他们所说的“非暴力”在所有情况下指的都是同一件事。非暴力，与公民不服从或者消极抵抗，这两个传统上似乎可以替换使用的词，是不是都一样呢？

格林汉姆的妇女一开始努力迎合盛行的（父权）概念：如何做到“非暴力”(nonviolence)，但是我们最后不得不拒绝来自传统和平主义者和反战份子的压力，他们从自身的不暴力不抵抗观点（带连字符的non-violence）出发，批评我们并且试图控制我们的行动。他们要我们模仿过去的道德和宗教模范，比如圣雄甘地或者耶稣基督；并且当警察或士兵们以暴力的行为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送上另一边脸颊”。我们面临要压抑自身的恐惧与愤怒的压力。在英国，典型的非暴力行为比如有，坐着或躺下来，表示我们的“消极抵抗”。但很多女性经历过男性暴力，“消极”便成了女性主义探讨的一个问题，因此也就不成其为一个解决方法。或许一些男人要去学会如何消极，而不是采用带着性别区分下的暴力。一些男人乐于看到女人们消极应对，或者在恐惧中无所作为。那么当被要求要在父权暴力面前不抵抗无作为时，很多女性会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没有安全感，这也就不足为怪了。想要做到安全地、不使用暴力地采取行动，我们必须能够自行做出选择，并且和权威的代表做好沟通。要能够真正地做到非暴力，我们首先要自信自己是强大的、有能力的。

正如“冲突”一样，权力也总是会自然而然地和暴力以及其它的暴力手段挂联在一起。这是因为父权的权力是归属性的权力、胁迫性的权力、施加于他人他物（包括自然在内）之上的权力。相较之下，女性主义理解的权力是联络性的权力、包容性的权力、串联行动的权力；正如在格林汉姆所用的网络的比喻，尤其是最近反抗灭绝所提出的一样。

当我们在面临针对我们的严重的暴力时，我们采取的是女性主义的和平运动模式，通过讨论，格林汉姆的妇女发展出一套有别于“消极”的行动指南，我们管它叫“女性主义非暴力”。我们中的很多人把这一套哲学、行为方式和女性主义非暴力的策略用在生活中。妇女和平营后来发展成为“格林汉姆的女人们无处不在”，最开始的行动是在全球各地，每年的5月24日庆祝“裁军与和平国际妇女节”，我们至今还在庆祝这个日子。格林汉姆的积极非暴力也被其它运动采用，比如黑衣女性运动，解体后的南斯拉夫妇女们共同站在“永远不服从”的旗帜下，以积极抵抗的方式反对军事主义和战争，并且采取行动声援遭受性暴力和强奸的妇女。对巴尔干半岛和欧洲其它地方的活动者而言，格林汉姆的歌“我们是永远不会被烧死的女巫”反响非凡。

男性也可以采取女性主义非暴力实践。尽管是在格林汉姆的运动中发展出来的，但它并不取决于生理上的性别。女性主义是挑战父权的政治，男性也要挑战并拒绝父权，从而实现和平、公正和环境的可持续。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都必须正视自己的感觉，包括恐惧和愤怒；还有像是哀伤（这是反抗灭绝提出来的，面对着宝贵物种、栖息地、生态系统、气候稳定性及天气模式的消逝产生的情感），以及爱与关怀。还有一些强烈的情感，有时让我们麻木，有时则激励我们去反抗暴力、虐待和压迫。通过女性主义非暴力，我们找到了能引导情感去面对和挑战武器、军队和政府的方式。并不是通过以暴制暴，而是通过我们积极的自身和正义感，找出有建设性的替代方式。当我们置身于核武器发射器或占领军事设施时，我们是带着自身和政治的责任感这么做的。今天我在反抗灭绝的行动中也看到了这一点。在反抗灭绝的网站上，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我们提倡公民不服从和反抗，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们恳请大家鼓起勇气，并采取集体必要行动，以做出改变。”虽然我对于反抗灭绝似乎把非暴力等同于公民不服从存有疑虑，但现在并不是做这个讨论的时候。

格林汉姆发展出符合女性需求的女性主义非暴力，既是哲学也是实践；从反抗灭绝的原则和经历来看，很清楚地，它也符合了今日新一代男性社会活动家的需求。当与滥用权力的人面对面时，我们不再消极，而是坚强有力，积极自信地去应对。我们不害怕冲突与争执，但我们选择不伤害生灵，包括那些要挟、以暴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也参加政治、法律，但依据的是我们的原则，而不是他们的原则。

“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从多个不同的和平、反核运动中发展出来，但它是基于单个议题的组织，是有着明确立法、外交目的——签订禁核条约——的网络。在成立之初，国际废核运动就从格林汉姆运动、“国际妇女和平与自由联盟”及比较父权的“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联盟”的女性主义-人道主义举措中汲取经验。出于多个原因，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的运作方式更为线性、更加等级分明。尽管有些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的成员认为非暴力是人道主义手段（类似于道德或宗教信仰）的哲学支撑，在运动内部占主流的观点是：非暴力是有用的策略和手段。

反抗灭绝现在尚处在起步阶段，但依据他们的演说和网站上的资料看来，反抗灭绝的原则和哲学更接近于格林汉姆运动而非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反抗灭绝比格林汉姆更具策略性，组织有方，避开了领导-被领导的结构，而倾向于自由和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尽管他们并没有明说。偶尔格林汉姆运动会陷入“无组织专政”，正如1970年美国女性主义者乔·弗里曼（Jo Freeman）指出的一样，她说：“表面的缺乏结构组织也经常会掩盖了非正式、未被承认、不负责任的领导方式，这更加有害；因为它的存在不被承认。”作为对比，反抗灭绝支持的是“由动能驱动的组织形式”，并发展出基于研究学习的策略，认为“动员3.5%的人口（就能）改变体制”。

关于“现在就行动”的紧迫性及非暴力所包含的行动种类还有很多可以谈。重要的是认清非暴力是包含在一个很大的范围中的，它是一种关于生命与改变的哲学，一套原则与实践，运动工具箱里的一种积极的策略；可以选择用它，也可以弃之不用，这取决于具体的目标和环境要求。

**超越政治**

反核与抵制气候灾变是深层次的政治行为，但反抗灭绝以此口号想要说的是，他们不搞党派政治，也没有所谓“左”“右”分野。反抗灭绝将“目标定在必要之处”并且强调自治与去中心化的重要性。和格林汉姆运动一样，反抗灭绝的组织结构类似于一个网络，而非等级制或金字塔式：“我们靠小组行动。这些小组在一个复杂的网络中紧密联结，这个网络随着我们的成长及学习而不断进化。我们希望建设的运动是参与式的、去中心化的，并且是包容的。”

关于权力结构、决策的拟定及控制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为本次讲演我选择的这些例子在这几点上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我们可以日后讨论。

**为生命反抗**

这个口号用英语读的时候有双重涵义（Rebel for Life），取决于将“反抗”这个词的侧重点放在哪里。可以理解为它鼓励人们进行反抗，将“反抗”一词理解为一种身份（成为抗争份子）。“为生命”是目的，是客体，也是在核战可能性及气候灾难面前的急迫性。格林汉姆、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及反抗灭绝都是以自己的方式为生命和人类安全所采取的反抗、抵制运动。格林汉姆的妇女在“为了地球生命的女人”的旗帜下游行。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将核武器的使用定义为侵犯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并将生命置于核战的危险中，是人道主义的灭顶之灾。反抗灭绝希望“创造一个适宜下一代生活的世界”。

**再生文化**

一段时间以来，在学术和生态圈中，“再生文化”成了个流行词；但反抗灭绝把它提出来，作为运动目标摆上了台。它倡导活动者们公开挑战自己、挑战有毒的体系，离开舒适圈，为变化采取行动。反抗灭绝强调创造一个“健康、有弹性的、适应力强的”再生文化的重要性。它也强调反省与学习其它运动及其背景与自身经验的价值，认为这对于计划与有效、可持续的变化必不可少。和格林汉姆一样，反抗灭绝“欢迎所有人及所有人的一切”采取积极行动来“创造一个更安全、无隔阂的空间”，并且“打破权力等级，推进平等参与”。

**结论？**

我无法在这个时候总结出一个结论，因为这需要一个公开、持续的讨论。我自己还有很多的问题。你的问题是什么呢？当你在考虑这些议题时，你有什么恐惧什么目标呢？就此讨论我们想达成什么呢？我们共享的世界，又何去何从呢？

1. 《愚昧年代》，2008-2009由法兰妮·阿姆斯壮构思及导演，片中由彼特·普斯特威特扮演2055年的档案管理员。<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Age_of_Stupid——>原注 [↑](#footnote-ref-1)
2. 关于参与者-研究者的优势与两难困境，可以参阅Sasha Roseneil, Disarming Patriarchy, Feminism and Political Action at Green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5.——原注 [↑](#footnote-ref-2)
3. 可以参考1955年由美国教友会发表的《对权力说实话：贵格会的非暴力研究》。这句话是1942年由美国同性恋黑人作家贝亚德·鲁斯庭在一封信中写的，后来当他因同性恋被捕时，其引用被删改。——原注 [↑](#footnote-ref-3)
4. 这一句话在很多反核运动中有不同的版本，但一开始是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1984年的《国情咨文》中说道：“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我们两个国家掌控核武器的唯一用途是确保这些武器永远也不会被使用。但这样的话，将它们全部销毁不是更好吗？” ——原注 [↑](#footnote-ref-4)